

开国大阅兵

林 治 波

为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为此于7月间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为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新政协筹备会议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的游行欢庆活动。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迄至当时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筹备委员会决定，以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处长唐永键、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北平市总工会主席萧明、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萧松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开国阅兵事关重大，聂荣臻、杨成武 紧张筹备，力求万无一失

举行开国阅兵，这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任务。聂荣臻、杨成武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受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那段时间，聂荣臻身兼六职：代理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司令员。后来，聂帅回忆说：“那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尽管日理万机，聂荣臻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国大典尤其是阅兵式的筹备上，为此多次主持会议，检查落实开国大典及阅兵的准备工作。他要求受阅部队抓紧时间，严格训练，高标准、高水平完成任务。就连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车辆万一出现故障如何补救，骡马失蹄、拉屎、撒尿的对应措施，以及飞机何时飞越天安门广场，晚上怎样燃放焰火等等，聂荣臻都作了细致的设想和指示。

聂荣臻尤为关注的是开国大典的防空问题。5月间，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曾出动六架 B—24 轰炸机，对北平南苑实施轰炸，毁伤我飞机四架，轰炸引起的大火烧毁房屋 196 间，死伤 24 人。为防止敌人的再度空袭，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北平的防空任务。聂荣臻还特别严令各受阅部队，在阅兵进行之时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保持阵容，保持队形，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更不敢有半点马虎。为组织好这次规模空前的大阅兵，他不仅查阅了许多中外阅兵的资料，而且多方求教。他走访的第一个人就是刘伯承司令员。早年留学苏联、经历过莫斯科红场阅兵的刘伯承，对杨成武细谈了苏军阅兵的种种情形之后，通俗而又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

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光！”说得大家都笑了。杨成武走访陈毅司令员时，陈毅以富于鼓动性的语调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杨成武还走访了在北平的原东北军将领和苏联顾问，一一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论证研究，《阅兵典礼方案》终于出台了。方案的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方案规定，此次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程序组织实施。阅兵式，全体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海军方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和华东海军舰队各抽调一个排编成；陆军方队由步兵一九九师、独立二〇七师六一九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一师、骑兵第三师编成。空军参加受阅是9月初才决定下来的，受阅部队由军委航空局所辖混合飞行编队担任。受阅部队共计1.64万人。其武器装备，以军兵种为单位，按种类集中，统一编组，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海上、地面到空中，使海陆空三军浑然一体，形成强大阵容。

方案拟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阅兵指挥人员，听取聂荣臻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和杨成武关于阅兵方案具体内容的汇报。毛泽东叮嘱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指挥部拿出了两套阅兵地点方案，周恩来 批示：阅兵地点以在天安门前为好

第一套方案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第二套方案是在西苑机场举行。两套方案都附有部队位置及阅兵行进路线的详图。

两个阅兵地点的优缺点都显而易见。天安门地处市中心，场面壮观；天安门城楼可作天然的阅兵台，足以容纳全体开国元勋和政协代表；四周交通发达，集中与疏散均十分方便。但是，在此阅兵需要断绝市内交通 4 小时；另外，因长安街狭窄，分列式无法展开进行，只能通过步兵八路纵队 骑兵三路纵队 至于装甲车 则只能走两路纵队。

相比之下，地处西郊的西苑机场可以避开天安门广场的缺陷。那里跑道宽敞，也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并且为欢迎党中央进城，刚刚举行过一次阅兵式。但是，西苑机场的缺陷更加突出，这里没有检阅台，重新搭设，工程巨大；场面远不如天安门广场来得壮观；距市区较远，几十万群众不易参加；阅兵部队只有一条跑道可供利用，进出不便。

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方案，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报告呈送中央后 周恩来用毛笔在报告的左上方签署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阅兵）日期在（新政协会议）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候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 二

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毛、朱虽然没有画圈，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阅兵地点就这样确定下来。

紧接着，天安门广场的大扫除开始了。堆积多年的垃圾山被卡车拉走，天安门和广场四周屋顶上的杂草一律拔除，破损的青石路面一一修补 斑驳的红色宫墙重新粉刷。北平建设局奉命在广场正中竖起一根 22 米高的铁管 方圆 3 米的钢筋混凝土墩支撑着高高的铁管。工人师傅仔细地 把铁管的缝隙用烧焊箍紧，然后用白漆油饰一新，滑轮及钢丝绳也都安装到位。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将在这里升起。

用什么方式升旗，在当时成了一件颇费斟酌的事情。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如果由它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亲手升起，当然最好不过；可是主席不可能打老远从天安门城楼下来走到广场中央，一下一下拉着绳子升旗。怎么办呢 阅兵副总指挥唐永键想出了电动升旗的点子。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电动升旗在中国是个新鲜事，谁也没干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力工程师，工程师答应试试看。经过紧张的研制，总算搞出来了。试了好几回，有时灵，有时不灵。究竟能否经得起大典的考验 谁也不敢保证。

受阅部队进驻北平近郊，广大指战员在 喜悦和兴奋中紧张训练，决心不负众望

7 月底 各受阅部队编组完毕 进驻北平近郊。8 月 1 日开始基础训练，9 月 7 日至 23 日进行师合练，9 月 25 日、27 日夜间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两次实地预演。

来自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第六十七军的步兵一九九师，在北苑营房组织训练。这个师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对于能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典礼，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该师指战员们感到非常自豪，因而士气高涨，训练特别认真。据当时曾任该师师长的李水清将军回忆：“训

练期间聂老总来了三次，朱老总来了两次，贺老总、陈老总也来过。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全军还没有一部统一的队列条令，训练无所依据。这个老总来了说不行，就改了再操练；那个老总来了又说不行，再改，搞得大家无所依从。后来找出了刘伯承司令员留学苏联时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再参考旧的《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步兵操典》，总算有了初步统一的规范。”8月的北平，酷暑难当，指战员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刻苦训练，皮肤都被晒黑了，有的晒脱了几层皮。雨天，照练不误，分不清雨水、汗水和泥水。他们把训练场当成了战场，天天拔正步，练分解动作，腰酸腿痛却不以为苦。从凌晨到夜晚，披星戴月，每天训练十五六个小时 几天下来一双新鞋就磨破了。

骑兵第三师是 1949 年 7 月由原察北军分区的三个骑兵团编成的 隶属华北军区。该师师长空缺，政委梁振中，副师长胡德利，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人、马都是经过苦心挑选的。全师在北平市郊沙河镇集结，由第六十八军参谋长宋学飞组庄训练。为了使人马站得稳、跑得齐，指战员从早到晚与战马滚在一起，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演练。各部队还发扬军事民主，遇到难题，就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战车第一师是来自东北战场第四野战军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大队建于 1945 年 12 月。第一辆坦克是从日本关东军的兵工厂里抢出来的，更多的是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来的。1947 年坦克大队扩编为坦克团，1949 年 2 月又扩编为战车第一师，师长曾克林 政委杨永松 拥有各式战车 870 多辆。1949 年 8 月初，军委向战车第一师下达了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任务，确定以师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为主，华北军区战车团和华北步兵学校参加，共同组成一个受阅战车师。从 8 月 18 日起 战车师集中丰台 在师阅兵指挥所的主持下 开始阅兵训练。各种车辆从单车教练起，逐步发展到排、连、营合练；摩

托化步兵则以队列教练为主，先地面，后车上，先分练，后合练。起初，训练场设在卢沟桥一带，但由于那里是沙地，土质太软，后来就移到五棵松训练。为了显示军威，战车师对全部车辆都进行了擦拭和喷涂，坦克、装甲车喷上“八一”军徽和车号，汽车轮外侧也涂上白漆。修理工对受阅车辆更进行了细致的检修，使所有车辆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原定的《阅兵典礼方案》中并未提到空军受阅的问题，只确定几架运输机参与散发传单。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决定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参加开国大典受阅，以壮观瞻。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飞行中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南苑机场正式组建，由军委航空局负责指挥，主要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必要时协助陆军解放长山列岛。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下辖两个战斗机分队、一个轰炸机分队，飞机共10架，其中P-51型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型教练机2架，多数是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的旧飞机，一部分是起义过来的。飞行员与地勤人员多数来自东北老航校。

军委作出空军参加受阅的决策之后，聂荣臻责成航空局长常乾坤迅速落实军委决定，并将空军领导同志请到家里，详细研究空中受阅的具体安排。常乾坤局长领受任务后，立即从东北老航校抽调19架飞机和13名飞行员来京，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将军。随后，航空局再从集中到北平的29架飞机中抽调17架性能较好的飞机，编成6个空中分队，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其中包括五种机型：野马式P-51型战斗机、蚊式轰炸机、C-46型运输机、PT-19型教练机和IJ-5型联络机。

方案、计划确定后，飞行编队立即投入训练，先是组织各分队分练，尔后组织四次模拟合练，最后到天安门广场上空进行了两次实地预

演。演练中，大家发现一个问题：由于飞机太少，如果受阅航速再太快，一下子飞过去就无影无踪了，这就很难让检阅者和人民群众满足。再从哪里搞几架飞机呢？实际上已有的 17 架飞机是东拼西凑才组装起来的，其他飞机都老旧不堪，根本不具备稳定的飞行能力，增加飞机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毕竟是聪明的，不知是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速度较快的 9 架 P-51 型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接到飞行编队末尾速度较慢的 PT-19 型教练机和 L-5 型联络机的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这个主意，在世界空军受阅史上堪称绝无先例的奇思妙想，却使得本来难度极高的训练难上加难。年轻的人民空军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投入了训练。

训练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花絮。9 月 23 日飞行编队进行第一次实地预演时，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飞机引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时间传到会场，正聚精会神开会的代表们受此惊动，有点坐不住了，会场内有些骚动。要知道，四个月前国民党军的飞机刚刚空袭了南苑，造成不小的伤亡。周恩来敏感地察觉到代表们的不安，自豪地笑着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他们也在实地训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代表们一听原来如此，顿时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就连不少白发老人也像孩子似地拍起了巴掌。

古老的天安门城楼迎来崭新的开国盛典。受阅部队
肃立东西长安街，接受阅兵司令员朱德的检阅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整，开国大典终于开始了！

大会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在刚刚确认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声中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一片欢声雷动。

接着 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在身旁工作人员的提醒下，林伯渠意识到有所不妥 随即又大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徐徐升起。礼炮队 108 门礼炮齐放 28 响 如报春的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人们仰望着高高飘扬的国旗，倾听着高昂雄壮的国歌声和震天的礼炮声，兴奋、欢乐、幸福、激动，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露天播音台向全国转播的播音员丁一岚，对准话筒，以激越的语调说：“主席按动电钮，国旗已上升到旗杆的顶点，开始在人民首都的上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 将永远飘扬在祖国的大地上。”

此时此刻，阅兵副总指挥唐永键的心情不光是兴奋，更多的是紧张。从毛泽东按动电钮的一刹那，他就屏息凝神，紧张地注视着国旗，直到升顶成功 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国旗升起之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 林伯渠宣布阅兵典礼开始。

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检阅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致军礼并高声报告：“受阅海陆空部队均已准备完毕 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部队，陆军的一九九师、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一师和排列在西长安街的骑兵第三师。朱总司令连连向受阅部队招手问好，受阅部队指战员齐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整个阅兵场上 气氛庄重而热烈。

分列式开始，受阅官兵由东而西通过天安门广场 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阅兵式完毕后，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说：“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 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 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随后，分列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率领受阅部队由东而西从天安门城楼前通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威武的人民海军。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的指战员。紧随其后的是多兵种的陆军受阅部队。

步兵师以一九九师两个团和独立二〇七师六一九团三个建制步兵团和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山炮、战车防御炮和通信兵各一个营 12 个步兵方队组成 在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的带领下，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由三座门雄赳赳地向天安门走来。当走到检阅主席台时 李水清洪亮地下达口令：“向右——看，敬礼！”全体官兵“唰”地变齐步为正步，同时举起右手，向主席台行注目礼 向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致敬。

在《炮兵进行曲》的伴奏下，炮兵第四师也向天安门走来。该师于 1949 年 1 月由华北军区炮兵第二旅扩编而成，师长高存信、政委李呈瑞。为展示我军炮兵的风采 炮兵第四师以自己最好的家底——75 毫米野炮、105 毫米榴弹炮、150 毫米榴弹炮、37 毫米高射炮、75 毫米高射炮组成强大阵容接受检阅。火炮由小到大，由低到高，整齐排列，均用缴获的美式中型卡车或十轮大型卡车牵引 依次前进 蔚为壮观。

跟在炮兵方阵之后的战车第一师，在《战车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犹如钢铁巨龙滚滚而来。即将调往空军的战车师师长曾克林站在观礼台上，自豪地看着自己的铁流方阵隆隆驶来。行进在最前面的是半履带汽车方队，战车团参谋长李自群高举“八一”军旗站在中央，两边由战士护卫。接着是由战车团团团长丁铁石、政委毛鹏云率领的战车团坦克方队。跟在坦克方队后面的是摩托化步兵团方队。

《战车进行曲》刚刚结束，又响起激越的《骑兵进行曲》。骑兵第三师受阅部队出场了。走在前面的是三个骑兵团，后面是一个骡马挽拽的75毫米野炮营。全师1978匹战马均以六路纵队跑步前进。各梯队装具整齐划一，战马的毛色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装，手握钢枪，腰挎战刀，军容雄壮，威风凛凛。

年轻的人民空军出色完成空中受阅 创造了世界阅兵史上的奇迹

正当战车第一师坦克方队隆隆驶过天安门之际，天空中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年轻的人民空军受阅编队开始出现在天安门的上空，与地面的战车部队遥相呼应，形成雄伟壮观的立体阵容。

空军阅兵指挥所接到受阅飞机起飞命令的时间是下午4时整。受阅机群接令后立即从南苑机场腾空而起，按照规定的航线、速度、高度出航。先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开始飞向天安门。西斜的太阳照射在机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9架P-51型战斗机编为三个“品”字形分队，以920米的高度飞在编队的最前面。第一个品字形分队由邢海帆居中领头，两翼的僚机分别由林虎、孟进驾驶。后面的两个P-51分队分别由杨培光、赵大海率领。排为“一”字形的两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第四分队由邓仲卿率领，以760米的高度飞越天安门。再后面是呈“品”字形的3架C-46型运输机组成第五分队，

由刘善本率领。最后是由两架 PT-19 型教练机和 1 架 L-5 型联络机组成的第六分队，由方槐率领。17 架飞机组成一个完整的空中受阅编队。飞在最前面的 9 架 P-51 型战斗机在飞越天安门后，在邢海帆的率领下，按照预定方案绕圈折回，天衣无缝地衔接在第六分队之后，第二次飞越天安门。这样一来，人们看到的受阅飞机不是 17 架，而是 26 架。狂欢的人们只顾高兴，谁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就连善看门道的外国记者也未察觉这个细节，他们在向本国发回的报道中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型战斗机为主，共 26 架飞机接受检阅。”直到 40 年之后，空军的专家们谈及此事，仍然啧啧称叹。一位专家感慨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一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难做到。”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开国大典之后才被人们知悉：受阅飞机当中，有四架战斗机竟然是全副武装，携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绝对禁止的。何以如此破例？后来飞行领队邢海帆对记者解释了个中缘由：“开国大典是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特殊情况下举行的，敌情十分复杂，如果敌机来袭，我们再落地安装炮弹，那就晚了。”

军乐队演奏新国歌， 礼炮队鸣礼炮 28 响

10 月 1 日下午两时半，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总指挥罗浪的率领下进入天安门广场，分成两个纵横各十路的方队，站到了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的两条有轨电车道之间。为显示威武整齐的新面貌和鼓乐喧天的大气势，军乐队将大小军鼓排列在两个方队的最前面。

因为这个临时组建的军乐团是超大型的，所以除了总指挥罗浪外，还配有一个举旗表示演奏继续的副总指挥，名叫王建中，是一个 26 岁的青年。

在毛泽东登上城楼的一瞬间，站在城楼东边的阅兵指挥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按预定计划，用手中的白手套向罗浪画了一个圈，罗浪立即挥动指挥棒，《东方红》乐曲顿时响彻天安门广场。

此前经过研究和讨论，一套以《八路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又叫《坦克进行曲》）、《炮兵进行曲》等进行曲为主，中间穿插解放区流行歌曲《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团结就是力量》等曲目的一整套开国大典乐曲被确定下来。而国歌的演奏是开国大典军乐演奏的核心。当时，国歌尚未确定，军乐团对可能成为国歌的《东方红》、《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均进行了充分的排练。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个结果出乎军乐团的意料。负责通知罗浪的张致祥忙里忙外，顾此失彼，竟然忘记了通知罗浪，直到28日傍晚才慌忙给罗浪打电话说：“哎呀，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国歌已经确定了，是《义勇军进行曲》。”罗浪顾不上埋怨，急忙找人抄写分谱，自己则连夜给国歌作了节奏式的低音配器。次日，全团就开始了紧张的演练。

10月1日下午在开国大典上，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按预定的程序，林老应宣布“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可是林伯渠只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而没有提及奏国歌，罗浪一愣怔，心想不管提不提，也得开始演奏了，随即有力地挥动双臂，于是雄壮的国歌第一次正式奏响在天安门广场。

同军乐队一样不可或缺的是礼炮队。

礼炮队来自华北军区炮兵部队，负责组建礼炮队的是当年晋察冀的老八路、建国时任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的高存信。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礼炮队。由于没有正规的礼炮，礼炮队由108门山炮组成，分为两组，54门一组。礼炮弹也

是用山炮弹代替 但卸去弹头 只响不炸。

在政协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 28 响。”有的政协委员提出质疑 说国外的最高礼仪是 21 响。毛泽东让阅兵指挥部起草说明 负责起草说明的唐永键心领神会 给了 28 响一个最好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至今 恰好 28 年。28 响礼炮 就是对中国共产党 28 年革命斗争的礼赞。毛泽东想要的就是这个解释。

礼炮队的训练同其他部队一样艰苦。当今的礼炮队实现了电操纵拉火，而在当时一切都是手工操作。108 位装填手要在同一秒钟把炮弹塞进炮膛，108 位拉火手则要在同一秒钟拉火鸣炮。全部 28 响礼炮要在两分半钟内施放完毕。为此，身高体壮的拉火手和装填手都经过了严格的强化训练。

开国大典礼炮群部署在前门一侧的南墙根，分东西两组列阵，背向天安门。炮手们早早把炮拖来，固定好位置，把山炮短粗的炮管昂起来 随时准备放炮。

3 时许，当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国歌奏响的一刹那，礼炮队 108 门礼炮同时鸣炮。一时间 巨响震天 地动山摇。

苏联电影摄制组进入现场拍摄， 美国军官包瑞德拍照惹风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开国大典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关注。苏联的一个电影摄制组专程由莫斯科来华拍摄，那一天他们也跟受阅士兵一样，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将几台摄影机配置于不同位置，做好了一切开机准备。3 时 50 分正式开机拍摄，直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摄影师才兴冲冲收拾机器，抱着几十盒沉甸甸的胶片返回宾馆。他们当然知道，记录着开国大典这个历史性场面的电影胶片，稍加剪辑定会成为辉煌大气的不朽之作。但是

很不幸，几天之后一场意外的火灾竟将这些极其珍贵的电影胶片中的大部分化为灰烬，辛辛苦苦的工作成果一下子烟消云散，苏联的摄影师们心痛至极，竟站在东华门大街上捶胸顿足，跺脚痛哭，引得路人好生奇怪。中国的知情者们后来才慢慢明白，这个损失决不仅仅是苏联的，更是中国的。

苏联专家被作为贵宾请入了开国大典的拍摄现场，而一个没有受到邀请的美国人，却只能站在远离主会场的东交民巷受阅部队集结地偷偷拍几张照片。这一细节，颇为典型地反映了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的鲜明反差。这位美国人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公安人员随即将此抓获，并向阅兵副总指挥唐永键报告说：“我们抓到了一个美国人，他未经许可擅自拍照我受阅部队。此人 40 多岁，中高身材，体态肥胖。经询问，名叫戴维·包瑞德，美军上校。公安人员的意见要收缴他的胶卷，曝光。请示如何处置？”

戴维·包瑞德的名字不能不使唐永键感到耳熟，随即记起此人正是抗战期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组长，抗战后期唐永键又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接待过由包瑞德派出的考察组成员。在延安期间，包瑞德对中共表示同情，并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系列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建议美国政府应当重视中共及其武装力量。但由于杜鲁门政府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激化了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终致美军观察组于 1946 年 4 月 20 日撤离延安。

一个曾经对我友好的美国人，作为不友好的美国政府官员出现在开国大典现场，究竟怎样处置此事，唐永键也不好决定。放下电话，唐永键迅速登上天安门城楼，将情况报告了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聂老总皱了皱眉头，示意唐永键稍等片刻，便径直朝毛泽东、周恩来走过去。

包瑞德这个名字，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不算生疏。当年美军观察组乘飞机到达延安，到机场迎接的正是周恩来，毛泽东还请包瑞

德吃过饭。听了聂荣臻的汇报，周恩来以诙谐的口吻说：“看来，包瑞德先生还想继续履行他的‘观察员’义务！”说罢以征询的目光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右手向外挥了两下，豁达而不经意地说：“让他拍吧，莫要管他。我们这都是公开的嘛，就是拿给人家看的，人民胜利了，他愿意当我们的义务宣传员 欢迎嘛！”

周恩来显然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旋即对聂荣臻说：“那就赶快通知下边 不必干预 不要收缴 也不可曝光！”

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奇怪，苏联专业摄制组堂而皇之的正规作品，毁于一场火灾；而美国一个业余摄影者的非正规作品却安然无恙。如今美国人手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照片 即出自包瑞德之手。

开国大典阅兵圆满结束了。后来，朱德总司令曾以他个人的名义款待陆海空受阅部队代表，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出席作陪。大家频频举杯，庆祝阅兵的成功，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宴会大厅内笑语欢声，气氛热烈。朱总司令自豪而风趣地说：“今天，我才真正成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难忘的开国大典受阅飞行

邢海帆

1949年10月1日，在我们伟大祖国诞生的这一天，我曾带领空中受阅飞行部队，准确整齐地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中央、毛主席及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一生从事飞行事业，经历过无数次的飞行，但这次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受命为受阅飞行总领队。

1948年底，我随叶剑英参谋长到北平参加接收国民党空军的工作。不久我奉命到东北老航校组织 P—51 战斗机训练飞行。1949年8月的一天，组织上要我带领7架 P—51 战斗机飞回北平。当时，我以为是让我回北平担任防空任务。因为在1949年5月盘踞在大陆的国民党残余空军，从青岛、汉中等地起飞，轰炸北平的南苑机场，使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了威胁。1949年7月，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一支空军作战飞行部队，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战斗机和飞行员，担任北平的防空任务。我想，这一次回北平准是担任防空任务。我回到北平后，组织上让我代理队长，因为，这支飞行部队刚成立不久，队长徐兆文同志在训练中受了伤，不能飞行，故组织上决定由我来代理队长。后来我听说，我们不仅要担负北平的防空，而且还要准备参